

对话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

#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须理性看待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在时隔12年之后,教育部重新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作为一项对3000多万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规定,新规定中的多项新增条款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就包括首次提出学生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并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如果将学生享有的这四种权利加以归纳,我们可以暂且将其称为对学校事务的“管理权”。那么,这项权利在制度方面的首次明确,对于高校和学生本身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就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

## 长远意义与短期意义

《中国科学报》:对于此次新规定中首次提出赋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您认为这对于高校整体管理会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

马陆亭:从长远角度看,该规定对高等教育意义当然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往往是过分强调对学生的“塑造”,学生被置于一个被动接受的位置。他们的诉求往往不受重视。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以及学生自身权利意识的提升,对学生诉求的反应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此外,从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参与这种治理的一定是相关利益共同体,而学生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方,自然也有这样的权利。

事实上,在国外的大学,负责学校发展方向决策的理事会中,总会有两个学生的“当然名额”。这一设置本身就代表了在学校的整体治理结构框架中,是有学生的发言权存在的。学生的诉求在校方的办学结构中也是需要被给予考虑的,这就明确了学生的权利。

《中国科学报》:您刚才提到的是长远角度,那么如果从短期角度看,您是否认为这种影响不会很大?

马陆亭:长远意义的重大的确并不能代表在短期内其重要性就能得以显现。因为我们将

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学生是否有足够的参与热情。学生受其身份所限,对于学校的很多事情并不了解。而且我们也并不需要他们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他们只需要反映他的诉求就可以,但很多时候,学生的个别诉求对于学校的整体工作而言并不是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否认在短期内,学生的所谓“管理权”可能会成为一种“摆设”。

当然,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不必太过沮丧,因为这是正常现象。对于现阶段的高校治理而言,只要学生有说话的地方,其诉求至少在制度层面可以得到体现,这就足够了。

## 学生中心与教师中心

《中国科学报》:似乎您并不是很看好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能力。

马陆亭:我个人认为,学生对于学校治理的参与度是有限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于大学而言,学生是一个流动的群体,教师才是相对稳定的群体。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以在大学的治理中,教师能发挥的作用更强。

在我看来,学校管理还是应该以教师为主。目前由新规定所引起的公众对于学生管理权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学生的权利并没有在官方规定中很明确地被提出,加之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治理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容易使公众对学生群体投入更多关注,但即使如此,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学生的管理权,大学工作还是应该以教师为中心。

《中国科学报》:您的这种观点似乎与当前一些学者的观点并不相同,比如有些人一直主张学校还是应该以学生为中心。

马陆亭:此前,教育部曾有过一种表述,即高校办学应以教师为中心,育人则应以学生为中心,对此我很赞同。我们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以学生为中心考虑问题,但学生毕竟是一个不成熟的学习者,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引导,但这种权利是需要引导的,而学校的教育活动还应该以教师为主,毕竟教师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国,虽然大部分高校实行的是学分制,但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采取的其实是“学年学分制”。但在美国,高校的学分制可以允许学生自由选课,而且学生获得足够的学分后即可毕业,这是一种真正的学分制。但这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有学生也会选择容易通过的课程,因此影响了学习的整体性。为此,很多学校规定了模块制,即将不同课程



划分为若干模块,学生在每个模块中必须选一门课程。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力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完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才培养而言,增加学生的选择性是对的。但在现实条件下,这种选择性如果不受限制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换言之,以教师为中心不代表不考虑学生的感受,而且增加学生选择性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子,但这种选择性是需要有指导和框架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学校行政工作也应该围绕教师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的身心成长进行,让老师“省事”才是一种合理的治理模式。

## 制度设置与方向引导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现阶段提升学生管理权的关键是什么?

马陆亭:我认为关键是增加学生提出自身诉求的机制和渠道,包括加强学生申诉的权利。

几年前,曾有一些学校在制定大学章程的时候请我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那时,如果学校的章程中没有提出建立学生的申诉机制,我希望他们能增加这一条款;如果章程中有类似条款但比较笼统,我希望他们能具体一些。

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大学管理工作中,由于具体事务庞杂,很可能会出现学生想法被边缘

化的现象。对此,增加学生的诉求感,尤其是学生对自己受教育权的诉求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在学生参加学校治理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清晰表达自身诉求,并能得到尊重和考虑,这就已经足够了。

《中国科学报》:在此次颁布的新规定中,其实是有关于学生申诉权的表述的,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表述过于笼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马陆亭: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我国,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思想重要?我的结论是,在和平时期,由于我们有党的教育方针和宏观层面的教育思想,因此在学校层面,制度要比思想重要。大学是按制度运行的,我们曾提出过很多好的改革思想,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权力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现象?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治理结构加以保证。

然而,这种治理结构究竟该由谁来设置呢?

在我看来,目前管理部门制定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时,可以先把这些权利提出来。将来在学校落实的时候,就需要有制度性的保证。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宏观的管理和指导部门,需要提出方向,学校则要将这些思想和方向具体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学校的完成程度会不一样,步伐也不一定整齐,但必须要保证大方向是正确的。具体到今天的问题上,就是要保证学生申诉的权利。

## 记者快评

# 「学院」为何改「大学」

■陈彬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目前存在“一些高等学校定位不清,热衷于层次提升或更名,盲目增设学科专业,办学特色弱化,同质化倾向明显”的问题。《意见》要求,严格依据标准审批“学院”更名“大学”。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更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统计,近六年来,我国共有472所高校更名,占高校总数的23%。而近十年来,全国近2千所高校中,有近一半改过名字。有学者甚至表示,1981年至2010年间,全国高校校名“存活率”仅为21%。

一所大学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代表了这所学校的历史、专业特长甚至文化积淀,在某一种程度上,这对于高校不亚于一笔财富。既然如此,高校频繁更名的背后,显然是有着更大的利益,否则高校便是在做“亏本买卖”。

这种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旦将学校从“学院”更名为“大学”,将“地区院校”更名为“全国院校”,即使学校本身不做任何改革,在公众的眼中,这所学校的“档次”也升高了。

有利益就有追求,这是很简单的市场规律。

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次发布的意见尽管对于遏制高校更名热有着一定作用,但可能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因为“诱惑”高校更名的现实利益没有改变,高校内部的“原动力”也没有改变。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制止高校在更名上做文章,首先要改变的,不是高校本身,而是公共的舆论环境,以及高校管理部门本身。我们需要反思,对于所谓“学院”,我们的宣传是否有所偏见,我国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是否也在有意无意地对学校的身份有所偏见,甚至把学校按校名分为三六九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高校的更名热很难在根本上有所改变。

当然,作为“更名热”的主体,某些高校本身也需要反思,虽然外部环境对自身发展有所不利,但高校是否将注意力真的放在了提升学校内功、抓科研教学工作上,还是为一些“虚名”而投入了太多精力呢?

# 师德师风建设要善从教学中寻找切入点

■朱延华

教学活动的日常跟踪和经常指导。

淮阴师范学院长期坚持校领导听课制度,规定每位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得少于8节;教务处负责人及各二级学院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得少于12节。还成立了以教学业务精湛的离退休老教师为主的督导组,开展经常性的跟踪听课活动,通过听课、评课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会诊”。学院两级领导经常不打招呼走进课堂听课,课后与执教老师交换意见,对课堂教学进行具体点评,提升了教师对课堂的敬重。

以庄重的课堂教学礼仪为切入点,提升教书育人的庄严感。仪式可以帮助人们按照社会规范表达情绪抒发感情,高校通过课堂教学规范和课堂礼仪建设,形成课堂独特的课堂仪式文化,有效增强师生角色感,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庄严感。如课前学生集体向老师问好,传达的是尊师重道的价值。上课不允许拿出手机,教室前三排要坐满,课前准备、课堂纪律等诸多方面的规范与礼仪,既对学生课堂行为进行约束,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师德师风要求。

以认真的师生课堂记录为切入点,提升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老师认真撰写备课笔记,学生认

真做好课堂笔记,是大学课堂的基本规范,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课堂笔记征集、开展教师备课笔记展示等活动,从中选出教书育人先进典型,生动有趣地推动师德师风建设。

淮阴师范学院校园媒体曾联合推出过一档《听课记》的栏目,借鉴《舌尖上的中国》等电视剧呈现方式,每周发布1集,每集发布4篇日记,每周4集构成1季。通过学生课堂日记集中展示课堂的精彩。集中刊发了16篇学生课堂日记,读者从中感受到了淮阴师范学院的风度,体验到了师生交往的价值,享受到了大学文化的精彩。

老师对学生的表扬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反过来,学生对老师的表扬,也可以激发老师的上课热情,可以激发老师的为人师表意识,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这一融媒体系列报道有效推动了师德师风建设。因为学生表扬了,个别本来不求上进的老师也有了进取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讲,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不容易。这样有趣有效的宣传报道活动,有效激发了广大教师做一个好老师的理想。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 域外传真

唐纳德·特朗普刚刚上任就颁布行政令,试图暂停向七个穆斯林国家发放签证(简称“禁穆令”)。此消息一出,世界一片哗然。美国高校反对声四起,并且反对理由充分。

“禁穆令”对穆斯林(包括当前和未来穆斯林)学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其实它的影响力还远不止如此,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签证变化以及对签证的“极端审查”。

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大学已经站在对抗“禁穆令”的最前线。前段时间,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17所美国顶尖高校向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交申请反对“禁穆令”。据这17所高校解释,“禁穆令”会直接影响校内学生和教职工,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无法正常返校,同时会降低学校吸纳国际人才的能力。

17所高校指出,“禁穆令”令人心寒,美国有大量国际学生和工作者,而“禁穆令”是在质

# 特朗普“禁穆令”困扰美国大学

■玛丽·奥哈拉

疑他们每个人的前途和价值;另一方面,很多怀揣技能的学生会因担心签证随时被撤销而放弃来美国发展,这是美国的巨大损失。

美国国内政治混乱,许多政策与国内大型机构利益相违背,处于这样氛围里的学生和社会大众,其恐惧和焦虑可想而知。

几百年来,有很多国际学生、学者、教师选择在美国学习、工作、居住,并且备受欢迎,他们促使美国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机构多样。我也曾亲身经历过美国学校的大门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敞开。通过这种模式,美国也在经济、研究、创新等各方面收获颇丰。

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发布的年度报告,2015年~2016年,有超过一百万名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注册入学,比上年增长7.1%。这一数字已连续增长10年。国际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2000万)的比例高达5%。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经

济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度,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贡献超过300亿美元。

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指出,同一时间,美国有超过40万工作岗位都是由国际学生任职的。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以斯帖·布里默表示,再过几个月,国际学生申请数据将会被统计出来,届时关于“禁穆令”的更多影响将会被呈现。然而据坊间传言,社会各界已经开始担心美国大学的未来。

除此之外,禁令还带来很多隐性影响。布里默强调,国际交流能促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这种好处虽然与工作、效益、研究成果相比难以量化,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好处。

这些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不可预测的,类似“禁穆令”的举措可能会导致国际学生不再受欢迎,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最受国际学生青睐

## 高教视点

日前,针对有关高校正在组织的2017年艺术类专业测试,教育部重申了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加强考试安全,严格规范管理,加大监督力度,确保艺术类专业考试公平公正。

艺考招生中的腐败问题,因前不久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前院长招生腐败被判刑而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不少舆论认为,这是由于高校艺考招生权力过大而造成,并由此建议减少甚至取消艺考校考。这完全是病急乱投医。艺考的招生腐败,不是因学校招生权力过大,而是因招生权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制约,以及艺术人才培养在学历导向之下严重扭曲。

与我国大学艺术人才招生相比,国外一流艺术院校的招生权力要更大,但它们的艺术人才招生却鲜有招生腐败,原因何在?不妨以美术专业招生为例,国外艺术院校通常采取代表作申请制,即学生向大学提交自己的作品,大学招办经审核学生的代表作,及中学学业成绩进行录取。放在我国这还得了?代表作说不定就会找人画,可国外大学对此并不担心。一方面,学校会认真审核代表作,如果发现代表作造假,其艺术梦想可能就此破灭;另一方面,即便被大学录取,这只是给一纸录取通知书而已,学校在艺术人才培养中的要求极严,如果达不到要求将被淘汰,不愿意没有艺术能力,花大笔钱去读艺术专业,然后被淘汰呢?再者,即使混到一张文凭,社会并不会用文凭来评价你,而是看你有无真实能力。

我国学生和学校对待艺术教育,首要的关注点不是艺术,而是文凭。对很多艺考学生来说,选择艺考是“曲线高考”,并无艺术兴趣,也不打算今后从事艺术事业。因此,能通过艺考被录取拿到一张文凭是相当部分艺考考生的艺考追求。我国大学的艺术人才培养也清楚知道学生的需求,并迎合这些需求。我国不少大学把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作为办学战略,根本不顾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在艺术人才培养中也基本没有淘汰。这意味着学生只要考上艺术专业,最后都可拿到学历、学位。

这就形成了艺考的灰色产业链。在此情况下,要求学校重视艺术类专业招生质量,最多在少数院校管用,大多数院校不会重视招生质量。学生的艺考目的和学校的艺术教育目的都不在艺术,而在学历。这一问题不解决,艺术教育都不可能正本清源,变得高雅起来。比如,教育部针对艺考校考问题,要求各地美术类艺考都要实行省统考,这貌似规范艺考招生,但也会进一步让艺考技能化、应试化。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并没有提高。

化解这一问题,根本的选择是取消国家授予文凭制度,由学校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授文凭。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再实行国家授予文凭制度,会在学历制度保护下制造劣质教育。一些学校会以授予国家文凭为卖点招生,把学校办为学店。与此同时,受教育者也更重视拿到一纸文凭,而非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我国相当部分学生考进大学后就不努力学习,就出于这一原因。

要求大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对培养质量负责,在目前国家授予文凭制度之下也很难做到。除了有学校本身就在做贩卖国家文凭的生意外,大多数学校也无提高培养质量的积极性。提高培养质量意味着要投入大量办学成本,对艺术人才培养更是如此,可有多少学校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呢?

因此,从长远看,我国治理大学招生、人才培养的老大难问题,需要改革传统的学位授予制度,建立学校自主招生、社会专业机构认证的新制度。这才可能消除以学历为导向的“曲线高考”现象。而在眼下,遏制艺考中的腐败,不是强化行政力量对艺考招考工作的领导,而是必须抓好三件事。

一是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不受行政力量干预,独立制定招生标准并实施。这是我国大学实行自主招生的关键所在,只有在实行自主招生的同时推进教育和学术管理改革,建立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的现代学校制度,才能遏制招生中的潜规则。二是招生过程公开透明,给每个考生的考试进行录像,老师打分必须签字确认;三是建立完备的信息公示制度,要公开艺术类等特殊类型考生不涉及隐私的所有信息,包括对有疑问的艺考生可查阅考试现场资料复查。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遏制艺考腐败须进行制度改革

熊丙奇

的国家不再是一个以国际教育为核心价值的国家,那么无数批学生、学者、教师建立起的国家之间文化交流桥梁将会在这个时代被破坏。

(作者系富布赖特学者、《紧缩措施的影响》作者,闾风云编译)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